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一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七三期 ——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3d）

【历史回顾】毛泽东、乔冠华、章含之、周恩来	温 相
【史实辨析】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史 佳
【当事者说】1973年政治局批周会议	章含之
【千秋功罪】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各抒己见】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	朱学勤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历史回顾】

毛泽东、乔冠华、章含之、周恩来

• 温 相 •

◇ 写在前面的话

毛泽东晚年疑心一直很重，特别是经历了刘少奇和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于早年追随的战友产生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而这种不正常的现状也让一群肖小所利用，就此成就一个后来为乱十年之久的佞幸集团。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文章提到章含之和乔冠华这件事，他们之所以会出现那样的境遇，这也和上面的这段话有点联系，用毛泽东后期的工作人员的话说：“主席晚年对于身边人的看法很重视，外面发生的事最后定的调子都是身边人回复的结论整理而成，恰恰不是政治局的讨论，显示了党内民主生活的不健康的一面。”（林克、张玉凤、徐涛、郑保中等著《回忆毛主席晚年岁月》）

这里我凭借着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接触以及访问当事人的经过来谈谈章含之、乔冠华、周恩来等人的一些往事，同时希望得到高手们的指正。

1. 章含之见宠的由来

章含之之所以能够成为毛泽东的所谓的英语教师也是有着一定渊源的，这和章含之本人开始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最主要的是由于章士钊的因素和周恩来的推荐。章士钊是被鲁迅骂作三一八惨案的幕后者之一的人物，按照鲁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旗手地位，被他老人家痛骂的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林语堂被鲁迅一句“西崽”骂的几十年抬不起头来，梁实秋被一句“乏走狗”压着以致于人们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才看到此公的学问的另一面，杨荫榆因为同时开罪于鲁迅夫妇，所以，最终虽为抗日而死也是沉寂了很久，而知道杨的也不过是知道她作为反动教育人士的定义。然而，奇怪的是多次被鲁迅指明大骂的章士钊却受到格外的礼遇，毛泽东亲口呼之为“行老”，实在是早年章士钊在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情况下帮助了毛泽东，而周恩来一直作为毛泽东和章士钊（也包括其他民主人士，周恩来兼任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是全国政协名誉主席）等民主人士联络的纽带，章含之的脱颖而出应该说不是巧合了。后来以章士钊北洋遗老的身份居然敢写信给毛泽东调解他和刘少奇的斗争，可见章士钊在毛泽东眼中面子之大了，党内当时也就是董必武一人敢于这么提议，而且还是在会议之后的表态。

章含之的聪敏和学识是毛泽东一开始比较喜欢的，尽管毛泽东更喜欢工农子弟，然而作为闲暇之时聊天的谈友来说，章含之显然比其他人合适一些，说起来毕竟是“世交”了。章含之本来对历史方面是没有什么具体感觉的，况且在那个时代中，帝王将相的研究本来就是禁区之一，章含之即使家学渊源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意思，所以，她把父亲章士钊推了出来，尽可能请教父亲，可是，章含之聪明的地方也在于此，她并不是照本宣科的把父亲的回复作为样本和毛泽东谈及，而是通过自己的细心的观察，投毛泽东之所好。比如明武宗朱厚照的评论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位皇帝是明朝历史上不多见的荒唐人物，民间的游龙戏凤就是根据他的史实改编的，然而，章含之在和毛泽东谈论此人时，章含之居然大谈其人防御宣大一带俺答小王子的所谓历史功勋，这简直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了。如果还是限于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的翻案或许没有这么令毛泽东瞩目，而明武宗这么生冷的人物在章含之嘴里说出之后竟然和毛泽东平素的想法暗合，也就此难怪章含之获得“后生可畏，也是一个人才”的天语褒奖了。

毛泽东对于章含之的器重是不言而喻的，鼓励章含之从政就是最大的表现形式之一，章含之那时候的身份既不是工农出身，也不是革命干部或者军人家庭，在特别强调家世的年代里，章含之连薄熙来等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都算不上，然而，因为毛泽东的原因，章含之很快进入政界，累官至国务院正司级，已然是当时名符其实的高干了。毛泽东曾经对章含之这么交待过：“你的眼睛也不能总盯着历史啊、外语啊，局面小了点嘛，要把眼光投到火热的革命中间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和群众打成一片。”而后，章含之也进到工厂等地作为和工农兵融合的代表，自然时间不会很长，经过毛泽东点将，周恩来同意，章含之很快进入了外交部。毛泽东对乔冠华、符浩、余湛等人说过：“我这个小老师不平凡，见解独到、语出惊人，你们以后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革命经验呢。”以乔、符等人的身份和一位副处长交流经验其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和加拿大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毛泽东第一个点名让章含之出任驻加国大使（正司长级），当时章含之不过是副司长，按照外事口的规矩，以副司长的身份外放欧美大国的大使实缺，将来很有可能回来作为副部长或者副书记的。最少也是部长助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章含之的信任程度，然而，章含之毕竟不是当年的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了，她自己说过，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君身不可远离，意思就是说离开君王的距离的不能太远。章含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她也深知三人成虎的道理所在，况且毛泽东本人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教训可找，一旦有人构陷

于章含之，而章本人又远在千里之外，何以能够上达天听呢？所以，她宁可以其他不充分的理由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自然也遭到毛泽东的指责，这点章含之也不讳言，不过，确如章含之自己担心的那样，随着迟群、谢静宜、王海容等人的崛起，章含之也是每况愈下了。

毛泽东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开始着力培养区别于四人帮之外的另一股势力，这就是以毛泽东部分亲属和身边人组成的第三梯队，这中间包括李讷、谢静宜、王海容、毛远新等，这些人比之张春桥更加缺乏政治经验，然而也比之张春桥等更加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在后来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斗争中这批人显然比张姚等人更为卖力气。这点倒和武则天晚年有些类似，当然也仅仅是类似。章含之就是这个用人路线的受益者之一，这是大前提，至于有人因而附会毛泽东和章含之个人之间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关系，我以为除了满足部分人的心里好奇之外并不能说明什么。

2. 章含之作为炮弹

章含之其人因为见宠于毛泽东，所以进入外交部之后虽然只是普通的干部，但在一些副部长、司长眼里此人手指通天，实在不可小觑。根据一些当年在外交部工作的老工作人员的回忆，章含之确实比较活泼，而且一直是坚持走上层路线的人之一，经常不怎么上班，可是很多重要的会议司长们却一定力邀章含之参加。章含之对外事务本身并不感兴趣，她最感兴趣的是外事口在阶级斗争中的新动向。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挺重要的批示给外交部、外办：“你们送的报告我是基本不看的，因为是不胜其看，随便一个什么屁司也能代表党中央说话吗？”而外交部最新的动态显然通过章含之之口传送到毛泽东耳朵中的不在少数。章含之因而很快就红了起来。

章含之和乔冠华的婚姻除了章自己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政治因素在里面，文革后期，毛泽东开始动手解除一些干部特别是业务干部的戒备，乔冠华就是其中一个，乔本人被搞的最惨的时候居然去卖报纸，周恩来回和毛泽东说：“乔冠华快是不行了，请主席看是不是暂时让他自己反省一下为好。”毛泽东转而对章含之说：“小老师，你代表我去看看乔老爷，要是他快要呜呼哀哉了，你就说我说的，乔冠华还是一个好同志嘛。可以烧一烧，不可以烧焦了。”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章含之并没有去，然而，毛泽东保护乔冠华的意思却传达到了，就此乔冠华得到解放，出来恢复工作。

应该说乔的解放和周恩来的关系很大，首先乔不是毛泽东准备置之死地的那种人，所以，周恩来敢于力保，其次，乔的业务是全国都很瞩目的，毛泽东也知道乔的本事，他说过：“大乔、小乔总要留下一个嘛，不要铜雀春深锁二乔嘛。”然而，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乔冠华在布置外交部批判周恩来右倾思想斗争会上不顾旧情，猛力向周恩来开火，为人所诟病。七十年代末外交部党委召开的批判乔冠华错误的会上有人就指出乔是小人，忘恩负义。而有关乔的人品很坏的定论也是这次会议上决定的。

毛泽东历来对身边的人有指婚的习惯，他自己多次不厌其烦的撮合他们结为伴侣也是事实，在章含之和乔冠华这件事上毛泽东也是如是办理的，只不过有点出入是并非乔冠华开始追逐的章含之，而是章本人主动靠上去的。用一位和章含之共事的老同志的话说：“章含之这人太热衷了。”自然是热衷于权势，她在毛泽东身边不可能不知道乔冠华此刻的行情看涨，而托身于乔这样富于感情、知识、权力和才华的现行高干当然也是章求之不得的。章后来的举动不得而知，然而毛泽东却是因此有过一个和乔冠华的对话，这是后人回忆乔冠华时提到的，目的不是为了章含之和乔冠华的爱情生活，而是试图证明乔冠华在毛泽东眼里的份量。毛泽东对乔冠华说：“……我历来主张公私分开，可是后院也要稳定，你现在成了家，×××（原文如此）不错，政治上坚定，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你业务上行，就是感情多了点，有点右，有时候喜欢扭秧歌。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就继续发扬，缺点就继续改正。”这个文章是发表在国内公开刊物上

的一篇纪念乔冠华逝世的文章，文中隐讳了很多关键文字，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毛泽东所提到的×××显然指的就是章含之。而章含之在回忆录中更加不掩饰毛泽东对于她和乔的结合的赞许程度。

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毛泽东对章含之的信任程度以致于导致章乔的结合，而是毛泽东当时亲手布置的反击外交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主基调需要为之配合的人手问题。章含之、乔冠华显然就是这次斗争的炮弹之一。小平后来总结建国之后三十年我国一贯的外交指导方针是这么八个字：“逢西必反，谈美色变。”周恩来后来一直在试图更改毛泽东左倾的外交政策，中美恢复对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周恩来后来准备应美方的邀请访美时，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台湾那个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谈？我们不搞一边倒，也不能挟外以自重。”周恩来利用外事上的突破来突破内政上的混沌的想法被毛泽东看穿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亲手发动对周恩来的打击的部分原因。

然而，毛泽东知道“恩来是要跟我走的”，所以，他也不愿意把事情闹得很大，当江青等人把问题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时，毛泽东出面制止。周恩来就此退居幕后直到他死。可是，乔冠华和章含之二人在这次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显然是非常不光彩的。这点邓颖超晚年一直不原谅乔冠华。最为滑稽的是在斗争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开始扶植王海容的势力，而准备抛弃章含之了。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海容、唐闻生作为新贵如日中天起来，连老谋深算的康生都对他们敬畏三分。章含之这时只有投靠江青等人了。这也是他们走向自我毁灭的开始。

3. 乔冠华的沉沦

毛泽东发动文革火烧干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高干们知道他们的功名富贵取自于谁？毛泽东曾经和周恩来、陶铸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不少人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忘了自己还是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这样的干部我看就是要烧一烧，让他们至少不要忘本。”（曾志《峥嵘岁月——回忆陶铸》）结果这些被烧的干部无一不是被打翻在地，一夜之间沦为人民公敌，其子女以及家庭支离破碎，前途阴暗渺茫，而后，毛泽东一句不要烧焦了，忽然又被解放，内中的大起大落之于人的心态的改造是天翻地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相当一批干部在1973年之后复出反而一改初衷跟定四人帮的由来，他们害怕了那种没完没了的折腾了，他们担心权力和荣耀的再度丧失。乔冠华就是其中很明显、很无奈、很悲剧的一位。

乔冠华自己知道他的再度出山和毛泽东息息相关，而和章含之的结合无疑把自己和毛泽东的距离又拉近了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乔章的结合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之所以说乔冠华不如胡乔木，问题就在于此，胡乔木后来能够那样继续威权在握，和胡本人对毛泽东的认识有相当大的关系，毛泽东用人一贯是疑人不用，就是说一旦他认定某人对他不够忠诚的话，那么即使不是立刻结束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也不会再对他抱有任何好感。所以，胡乔木得知毛泽东评论自己“改换门庭”后也比较识趣，七五年之后更加紧跟小平，彻底改换门庭了。而乔冠华之于毛泽东的关系显然不及胡乔木，当然他也是毛泽东赏识的人之一。不过他没有领悟到胡乔木那个地步，意即胡乔木以文章见重，乔冠华以业务见重，而都不是以思想见重（例如张春桥），所以，这种赏识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形势的，乔复出之后急于建立新功，希以固宠。毛泽东抓住他的心理加以利用和诱导，使之成为攻击周恩来的一颗难得的炮弹。

在整个一九七四年中，围绕着外交部的工作开始对周恩来的斗争升级，而乔冠华在此间的表现显然是十分让最高满意的，当年国庆节，章含之通过江青之口得知乔冠华将要出任外长，由此可见上边对他的酬庸。然而，也是在这一年，周恩来开始逐步推出政治舞台，而把邓小平推到了前面，长沙告状的失败既说明了周恩来当时圣眷未衰，也说明了毛周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假如周恩来的位置相当稳固，江青等人何以敢于让王洪文做那样明摆着的蠢事呢？乔冠华

夫妇自然也想火中取栗，像外长这类异常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圈定，谁敢定论？

如果说乔在七四年反对周恩来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在七五年之后不能很好的和邓小平配合、甚至是为难的举动就不那么好让人理解了。像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这些人虽则也属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然而后来毕竟都给了出路，待遇上也基本按照他们本来应该享受的给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奉旨办事”，虽然他们和四人帮也有勾结，可是更多的则是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而乔冠华夫妇在决定政治赌注之后投向四人帮便完全变了性质，四人帮当时已经构成结党营私这四个字，连毛泽东本人也不为之隐讳，况且这几个人的政治名声实在太糟糕，政治行为实在太差劲，李先念回忆四人帮时说：“他们那几个人当时可是不得了，上窜下跳，谁要是说的不对了，他们就搬出主席的大帽子来压人，政治局成了他们履行手续的地方了。”当他们准备进一步收拾周恩来时，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坐不住了，因为如果周恩来都能被他们拉下马来，那么他们这些不如周恩来的或者在周恩来之下的又当如何呢？岂不是很明显的事。叶剑英和李先念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问如何布置开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局工作，毛泽东这才重视起来（这个主意是叶剑英出的，不明着为周恩来说话，正话反说），他指示政治局，才有了后来那段著名的批评江青“迫不及待”的讲话，毛泽东说：“这几个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人有份，也包括春桥、文元。”然而就是在这样是非分明的斗争中乔冠华还是没有吸取他应该吸取的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终于走进了政治生涯上的死胡同。

“风庆轮”事件发生之后，江青开始布置整邓小平，外事口首当其冲，因为邓小平当时主管外事工作，乔冠华自然不肯落后，他从章含之那里得到这样的话：“要做反潮流的干将，不要做资本主义的大将。”乔冠华在三次王洪文主持召开的关于风庆轮的讨论和洋奴哲学的会议上都说了不利于小平的话，其时在1974年10月中旬，而此前乔冠华已经被明确为下一届的外长了。一九七六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之后，胡乔木被勒令检查，胡说自己身体不好，认识不上去，一句话保住了晚节和后来与小平等人见面的机会，而乔冠华则在章含之的提醒之下，一马当先的冲了上去，其结果当时自然快意，而后呢？当邓小平被停止其他主管工作之后只保留主持外事口的权力时，身为外长的乔竟然不去做任何汇报工作。比较一下和乔一起上了“贼船”的副外长余湛的经历就知道了。余湛也是毛泽东提议和四人帮信任的，然而，余本人在一九七六年的事情上态度相对消极的多，而且保有对小平足够的尊重和理解，余湛说：“小平同志的错误能够检讨的还要听他的检讨，不能检讨的就要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七八年余湛下台，无处可去，邓小平一句话，做了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仍然是正部长级待遇。（邓小平是五届政协主席）相比之下，乔显得就不那么“厚道”了。更臭的是当华国锋接管权力之后，乔因为工作上的事和华国锋公开顶撞，成为华国锋整掉他的直接原因。一九七七年华国锋从朝鲜回国问姬鹏飞：“我主持外交工作，同志们有什么看法？”姬鹏飞自然是奉承一番，而华国锋这时就指出：“乔冠华这个人很骄傲，一向自以为是，他当年整总理，不听主席的部署，对我的工作横加干涉，现在看也是志大才疏。”（姬鹏飞《我在外交战线四十年》）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当月底乔冠华被隔离审查，十一月外交部布置召开清理四人帮残渣余孽的批判大会，点名批判乔。从1974年国庆算起不过区区两年。

章含之此刻也并不好受，早在1975年王海容等人就攻击章含之架空乔冠华，对外交部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一九七五年底外交部内部开始对章含之的批判，用毛泽东的话说：“请同志们帮助章含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章含之没有就此歇息，反而变本加厉的怂恿丈夫在四人帮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覆顶。

一九八一年，王震难得问起乔冠华，说，现在外交战线缺少老成的，乔要是身体还行可以出来顾问一下。这样，乔有了对外友协顾问的名衔，然而，当有人准备提议乔出来主持一下具体工作时（胡耀邦还具体批示了），因为乔的身体（癌症晚期）和以往的政治原因，没有了下文。而当年和乔齐名的小乔胡乔木此刻正踌躇满志的即将进入中共十二大政治局和书记处。

当年，乔冠华和章含之结婚时，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示祝贺，毛泽东还说了句玩笑话：“这回乔老爷真是上轿了。”然而，周恩来后来则说：“不是乔老爷上轿，而是乔老爷上当。”这句话据介绍有人曾就此事问及邓颖超，邓颖超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一句话。

~~~~~

## 【史实辨析】

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 史 佳 •

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在中国人的心目里，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已经被逐渐淡忘，这并不应该责怪那些今天30—40岁的一代人，文革发动的时候他们才出生，或者还没有出生，今天，当他们坐在出版社编辑部的办公室里，看着那些当年红得发紫、而在过去的20年被人们遗忘的人物的回忆录时，他们觉得好奇，觉得有轰动效应，于是，象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谢静宜、徐景贤……等等的名字又开始出现在书市、互联网或者电视节目上。其中一位最令人恶心的女士是章含之。

这些年，章含之就她和乔冠华的婚姻写下了不知道多少文字，口口声声诉说她的乔冠华的爱情有多么的可贵和忠贞，对乔冠华在文革后的处境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章含之至今还不敢说，乔冠华的被处理是冤案！但是，她的所有谈论关于她和乔冠华关系的书籍和文字，都明显地表露这个意愿。

关于对乔冠华的处理到底是不是冤案，就象当年对四人帮的处理是不是合法，自有史学家来论证。我在这里想谈的是，章含之故意掩盖了她和乔冠华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也就是导致了乔冠华后来沦为四人帮同党的原因：没有章含之做引路人，乔冠华可能还不会陷在四人帮的“帮围子”那么深。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四人帮的斗争中，章含之不仅自己站在了四人帮一边，而且把乔冠华拉下了水。

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要感谢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先生最近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观地揭示出了文革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把文革历史当中一个始终被掩盖、被篡改的事实基本澄清了，那就是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后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后来的评《水浒》，就是针对周恩来的。这是公开在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政治斗争，在批周这一点上，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官方舆论界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点穿；而事实上在1973—1976年前后党内上层（省军级以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早已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1973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邓颖超的这个做法很合乎周恩来的为人。尽管从文件上已经很难查到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还是有不少记载和回忆。《晚年周恩来》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注：毛泽东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已经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好。在这次会议上，乔冠华是作为外事口的代表，对周恩来进行重点批判的人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由周恩来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职业外交家，他怎么样会成为批判周恩来，后来又堕落为四人帮内定内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关于乔冠华一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在章含之介入之后乔冠华生活发生的变化。

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毛泽东自己有英文秘书林克，何以又要聘请一位当时只有20多岁的章含之作为英文教师，这只有毛泽东和章含之知道了。文革后期。外交部有一批小姐，她们是王海蓉、唐闻生、罗旭等，当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们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进言，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下，担当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凭借着曾经是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头衔，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毛泽东想把章含之派到加拿大去当大使，而拆散她的乔冠华之间的关系。

乔冠华尽管当时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还没有走进到中南海的圈子里面，或者说，还置身于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是自从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从此乔冠华就随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当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1973年批周会议，并且后悔没有为周恩来讲句公正话。

事实上，她和乔冠华岂止是没有讲句公正话，他们是被毛泽东从外事口搬来的轰击周恩来的重炮。从此，乔冠华通过章含之成为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的一门重型武器。

章含之在书中写道，乔冠华为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周的发言很后悔，曾经在1975年见到周恩来时当面向周恩来道歉，据章含之记述，周恩来对乔冠华表示了谅解。但是同样的场合，周恩来在1975年在305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接见结束之后，医生护士和在场的工作人员要求和周恩来合影留念，周恩来同意了；合影之后，周恩来向众人说：我希望你们当中的人不要在我死了之后在我的脸上划叉子。当时所有的人都大为吃惊。乔冠华是当时参加合影留念的人物之一。

诚如章含之书中所写，毛泽东事实上对乔冠华一直不满意，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政治上右倾，因此乔冠华一度向左派靠拢，而最终乔冠华和章含之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对乔冠华不感冒；这

使得已经结为夫妇的乔冠华和章含之逐渐脱离王唐两位小姐，试图在毛泽东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和江青、张春桥等走近，最终进入江张内阁的班底。章含之著书从来不谈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乔冠华为什么被四人帮选为副总理，又为什么在四人帮倒台后被撤职，章含之自己为什么被立案审查。按照章含之的说法，似乎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共中央无缘无故冤屈了乔冠华，撤销了乔冠华的职务，而对她自己被专案组审查一事更是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她章含之和乔冠华不仅不是四人帮的随从，反而倒是四人帮的受害者。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并没有隐瞒的必要。无论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不过都是被毛泽东掌上玩弄的小棋子。现在回过来看那段历史，他们都是牺牲品。需要现代人警惕的是这些章含之现象、徐景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文革博物馆，反倒是这些当年的打手可以靠编造歪曲历史的历史，大赚其钱。周恩来九泉之下何以能够瞑目，张志新烈士的献血岂不是白流了？

~~~~~

【当事者说】

1973年政治局批周会议

• 章含之 •

我在外交部的轻松日子其实只是短短的一年多。到了1973年春天，我就意识到一场政治灾难就要来临，前一年的秋天，我正在联合国开会，被紧急召回接待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匆匆回到国内才听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和，他要撤换翻译，所以召我回来后备顶替。这时，我就听到了一些对周总理的非议，我很怕被卷到一场上层的风波中去。7月1日，我父亲在香港逝世。7月4日，我还在香港时，毛主席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五人谈话，并说要他们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十分明显。我和冠华那时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反而加强了我必须与他在一起，共渡险关的决心。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报告。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同意，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作检讨，有人传达毛主席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一时人心惶惶。毛主席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冠华是做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天，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虽然这风浪的阴影在人们心中，尤其是部领导们的心中并未抹去。这年秋天，我随代表团再度去联合国开会。我已经没有了前两届的平静心情，总担心这突然而起又无声消逝的风暴是隐藏在天际，不知何时又会卷土重来。对于政治的变化莫测，我和冠华都一片茫然。这年的10月，基辛格又要如期访华，我在纽约对冠华说，我担心基辛格访华又会惹出什么祸来。那年联大正逢上中东战争，安理会又在紧张开会，我劝冠华不如避开风口浪尖，给总理写个报告，就说安理会辩论激烈，离不开，就不回国参加基辛格的接待了。冠华犹豫不决，但最后也同意了。不过周总理很快回电，严厉批评冠华怎么分不清主次，命他必须如期回国参加中美会谈。

十月的基辛格访问果然导致了后来的政治局“批周”会议。外交部姬、乔、黄、仲（指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编注）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指王海容、

唐闻生——编注）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指示”由她们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这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

□ 摘自《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

## 【千秋功罪】

### 读《晚年周恩来》

• 刘晓波 •

#### ◇ 周恩来的身后哀荣

听说高文谦所着《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不小的争论。我先看了老友胡平的《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见本刊zk0309a——编注），之后才读到《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在演讲中感叹：“周恩来难评！”论者胡平更感叹：“评周最难！”且列出五条原因。我以为，胡平对评周之难的原因和对周本身的解析，已经颇有穿透力了。

我要补充的是，本书提供的一些资料，印证了我对周恩来的评价：在中国漫长的独裁史上，如果说，毛泽东将绝对极权发展到前无古人的程度，那么，周恩来就将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生前，尽管在中共夺权时期，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曾一度高于毛泽东，然而，自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并在刘少奇等人的帮助下、确立了党内的绝对权力之后，周便一直处在毛的笼罩之下，唯唯诺诺地为毛服务。而且，不论其他中共高官的沉浮多么触目惊心，周却始终稳坐第三把手的宝座；只要是由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无论其资历、能力、品德如何，周恩来眼看着他们的后来居上，又目送他们一个个身败名裂、甚至尸骨无存。周非没有任何嫉恨之心或恻隐之心，反而紧跟毛的翻云覆雨，该助其高升时就尽力扶持，该落井下石时也毫不犹豫，而且，一切都做得无动于衷。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稳坐三把手之位的不倒翁，才能作为毛泽东的最得心应手的弄权工具。没有周的无条件的鼎力襄助，毛泽东不可能那么为所欲为。起码，毛在党内高层中实现其个人极权意志的决策，用不断的党内清洗来发泄其权争嗜好和猜忌心理的折腾，用全民运动来实现其权力野心的放纵，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畅，一手遮天的局面也难以形成。

这就是我理解的“谋事在毛而成事在周”。中共掌权初期的五人权力核心，周是几乎陪伴毛泽东走向坟墓的唯一元老——周以终身总理之尊先走一步，毛以终身党魁之尊紧随其后。正如高文谦所言：“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而周所得到的，又何止于“善终”！

死后，中共掌权后所制造的一系列大灾难之罪责，大都由毛泽东背着，毛的遗臭万年，可以与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正日等极权者相当，即便在中共的正统评价之中，毛也属

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而周恩来却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哀荣，不仅博得了党内高层和社会名流的普遍好感，而且赢得了百姓们的自发追思。虽然，毛泽东没有亲自参加周的追悼会，也许会令周的亡灵难以瞑目，因为周一对毛如何评价自己耿耿于怀。但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足以令任何中共元老的亡灵艳慕。

何况，1976年的清明节，在中共政权的中心北京，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自发民众运动，“四五运动”又是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悼念和对当代秦皇毛泽东及其四人帮的声讨，已经昭示了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褒周贬毛。特别是文革刚刚结束时，一篇篇出自复出的中共元老和社会名流的回忆文章，一首首一曲曲出自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的颂歌，使周恩来在当时中国几乎成了“完人”的化身，集超凡的人格魅力、为政智慧和待人品德于一身。甚至直到现在，连一些晚年觉悟的老党员，在回忆自己的生涯时，凡是对周恩来的记述，大都是正面形象。

就政治人物热衷于死后声名的欲望的实现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

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

国人对毛、周的评价，也随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改革的魅力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毛泽东是暴君和乱源的代名词，而周恩来是儒相和现代化的象征。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级分化和权力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同步兴起，使毛泽东的名字再次响起，作为平等、廉政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性符号。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毛泽东也仅仅是历史变迁的工具而已。

#### ◇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速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

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

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着，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

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着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 ◇ 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

读《晚年周恩来》，让我想起文革记录片的某些片断。

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天，某朋友正在筹拍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青春片。因为他生于六十年代初，文革时还是小孩子，所以，为了准确把我文革的大背景，他从新闻电影制片厂找了许多文革记录片。显然，他看过后受到震动，才会特意邀请我去一起看。果然，作为在文革中度过整个青春期的一代人，事隔多年，再看当年国人的狂热，顿生匪夷所思之感，有些细节确实会令有心人极为震惊。

比如，老毛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站在毛身边的周恩来，戴着像章和袖标，端着半残的右臂，左手挥动着小红书，和广场上几十万小青年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恩来同志奋力高举小红书，手臂伸向空中，整个人也向上用劲，看上去脚尖都踮起来了。由于太卖力向上，身体和头颈倾斜着，加之声嘶力竭地高呼，脖子上的血管和青筋凸起，绷得似乎就要断裂，在给恩来的近景镜头上清晰可见。

朋友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极为震惊。至于嘛。不熟悉老毛的小青年如你我等辈，远远地看着红太阳，全身抽风，崇拜狂热症大发作，在所难免。而他周恩来同志已经和泽东同志并肩战斗了几十年，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一度比毛高，何至于如此表演效忠！你能想象吗？如果有一天，咱的一个熟人当了大官，咱俩也必须跟着喊万岁，能假戏真做到青筋爆起血管凸出的程度吗？还不至于吧。”

另一个绝妙细节更让人过目不忘。那是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老毛居中，林彪和周恩来一左一右。老毛象征性地对台下狂热的代表们挥了挥手，身子就略微弯曲，似乎要坐下，后面的女服务也赶紧上前搀扶。没想到，不知为何老毛没有坐下，身体在稍微前躬的姿势上停了瞬间，又站直了，再次冲着代表们鼓起掌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再看老毛左右的林与周，两人的相互较劲便一目了然。林彪看到老毛已经有了要落座的动作，就一下子坐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老毛又站直了。而周恩来却用眼睛的余光一直瞄着老毛，尽量保持与之相同的节奏。老毛身体稍弯，恩来也跟着稍弯；老毛停留片刻，恩来也停留片刻；老毛突然站直，恩来也随之站直；老毛鼓掌，恩来也鼓掌。整个过程的同步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而已经落座的林彪，没能与红太阳同时起落，当他忽然发现老毛没有坐，又站直了，而且就在他身边，他的面部表情就一下由微笑松弛变得沮丧紧张，几乎是极不情愿而又下意识地跟着站起来鼓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林彪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侧伸出头，目光越过居中的老

毛，怪异地盯着与老毛完全同步的恩来。恩来明明意识到林彪的恶意目光，却全当浑然不知，随老毛一起鼓掌，直到老毛完全坐下，恩来才缓缓落座。

在观看这一细节的过程中，朋友不断发表评论性解说，让我注意三人的关系和林、周的表情。最后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林彪看恩来的目光中所隐含的，不仅是嫉恨，还有极大的轻蔑：“瞧你那副谄媚相！”

我的文字远不够传神，也许只传达出画面冲击力的百分之一，如若不信，诸位可以找来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记录片看看，镜头本身对视觉的冲击才会让人信服。而且，与这种真实的历史镜头相比，现在的帝王戏中的臣子媚态，特别是微妙处的表现，实乃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官场竞争：极权者具有任意废立的绝对权力，故而，所有的高层官僚都在争当极权者个人的宠儿。

人们都说，林彪很会捧毛，他的窜升全靠制造对老毛的前所未有的个人崇拜，小红书、活学活用、四个伟大等等都是他的发明。但是，在九大的主席台上，他对极权者老毛的了解和紧跟，与颇有儒臣风范的恩来相比，立马见出高下之分。丞相恩来对毛帝王的洞察和紧跟之精湛细致，几乎深入到每一微妙的细节之中。对比之下，林彪就显得过于粗糙马虎。

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极权者对臣子们是否效忠的判断，有时就是荒唐到于细微处洞见忠奸。林彪的先于老毛坐下，可能就会被满腹狐疑的老毛视为“目中无人”；而恩来与老毛的绝对同步，就会被极权者解读为发自内心的臣服。林彪最后被老毛视为有野心，在与恩来的争宠竞赛中身败名裂，也许就是由这点点滴滴的细节印象累积而成，因为在效忠竞赛的大节上，林彪做得远远比恩来突出。而恩来同志的效忠表演，于细微处方见真功夫，远在林彪的大处着眼之上。

~~~~~  
【各抒己见】

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

• 朱学勤 •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文化革命就是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呢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胡适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那个一、二十年代里面，结派而成的文化革命的理想。第二个文化革命就是打引号的“文化革命”，恰恰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文化革命”，所谓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这个“文化革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对后一个“文化革命”的否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层面，有那个历史决议。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界普遍的否定。知识界普遍的否定呢我觉得是必要的，甚至于到目前为止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知识界的否定呢，它局限在后一个“文化革命”的本身，而没有打开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就是这个文化革命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知识界二十世纪以来世世代代追求的那个文化革命的理想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首先看在1640年以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美革命，那么英美的革命呢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小革命的模式。为什么说小革命呢？英国呢有政治革命，杀了一个国王，再迎回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复辟再把它赶走，把这个国王的女婿和他的女儿请回来，这就长达四十八年的英国革命的这个内容，最后终结在1688年的“光荣

革命”，就是光荣妥协了。那么它是革命，杀了国王，它触动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甚至于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呢它是在1688年以后，马上就是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臣民的信仰领域。政府权利是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那么它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的第二年，用立法的形式通过了一个《容忍法》，就是国王要容忍自己治下臣民保持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那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大部分都是什么，宗教生活的时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允许不同的精神选择。所以1688年以后经过这场革命他们马上制止革命的野马撞倒拦绳，撞倒栅栏冲向文化领域。就是革命迫不得已要在政治领域发生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进入到第三阶段进入到文化领域。

美国革命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它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呢？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变动非常深刻，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什么？共和国，第一个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但是美国革命在1787年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制定干预公民精神信仰的法律。那美国革命几乎是0.5场的革命，它比英国革命来说它只有政治革命它连社会革命都没有，更无须谈文化革命。英美的革命它们内在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而且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文化不能碰。

那么法国革命呢，俄国革命就不一样了，法国革命我们知道教科书告诉我们三阶段。1789年到1790年第一阶段，所谓大资产阶级执掌革命领导权的阶段，充满妥协，不彻底。第二阶段那么比如说就是吉伦特派这个阶段，也是不彻底，也是妥协。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1793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到1794年嘎然结束，整整一年。这一年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比前两个阶段激进、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革命的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所以雅各宾党人称自己这一年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他们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你看在中国人搞“文化革命”前的二百多年，法国人已经搞过文化革命了。甚至于有些文化革命的性质和我们1966年“文化革命”的这个性质非常接近，比如说要强迫人民改变宗教信仰，那么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开始改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改名字，改名字啊，张为东，李为青，毛为彪，他们那边也改成革命性的名字。路名改了，把比如说东郊民巷要改成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他们也改路名，改地名啊。扑克牌上的四个老人头，我们“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改啊，改成革命的符号。二百年前法国人就做过，也改过。那么法国人那个时候认为自己为什么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大就大在什么，它把革命从政治进入到社会，从社会引进到文化。他们认为没有社会革命无以保障政治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文化领域里的灵魂革命无以保障社会领域里面取得的成果，这是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也是啊，俄国革命我们现在只记得的是打冬宫政治领域，实际上俄国人到后来就是搞得天翻地覆也是文化革命。那么这场“文化革命”留在我们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个残余的符号，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习焉不察还是用的，我认为这个符号是最反动的一个符号，就是天天年年都要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把中世纪色彩如此浓厚的一个口号，延伸到俄国革命来，这本身就证明俄国革命误入歧途了。

那么这两场革命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它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

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那么我讲清楚世界近代史上两种类型的革命以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选择。我认为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那么逐渐地朝我们器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逐步地认识到，所有的差别关键是制度的差别，这样才有“戊戌变法”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那么“戊戌变法”变的什么，就直指制度本身了。那么这场变法失败，失败并不说明什么此前追求方向的错误。我认为从1840年到1898年这个将近六十年，一个甲子，里面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后来是怎么走向岔路的呢？

一，梁启超逃亡海外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不是就是把这一场失败，就是指向比如说康、梁集团的，政策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幼稚、操切、失误，而是大而化之这些，把它归结为是整个民族国民气质的差别。就把一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人谋不臧，归结为整个民族都要一起负责的是什么文化问题。梁启超的作品到今天我都非常欣赏，但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戊戌变法”之后，用文化原因总结一场具体的制度创新失败的第一人。梁启超之后那么就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的这个消息捶胸顿足说，这次回去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回来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就是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这样才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当中涌现的就是一个闯将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一辈子就是信守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的信仰，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那么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周围呢，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左翼的青年，这一辈子都是信仰鲁迅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所以你看“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急剧的转向，它转向转在哪里呢，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制度选择，以俄为师的一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就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人的美学光芒。

这样一来呢，所以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是悍然决定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面的这件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文革”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老干部们，你们只有政治目标，你们要夺江山打天下，你们不知道我带你们爬雪山走草地之前“五四”时代已经形成的文化理

想。过了这个雪山，爬了这个草地，得了这个天下干什么，要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我的政治权力来发动“文化革命”，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面貌。所以我认为，今天就是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你只有挖到这一步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避免这样的惨祸再次发生，再次发生。所以我的看法跟知识界的大部分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孽，也不是一个加四个所谓加“四人帮”的罪孽，不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罪孽，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胡适也罢，鲁迅也罢，茅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你去看看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面现当代文学的教科书里面，你们找到的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理想核心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啊，都是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

等到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这才惊呼你不仅仅是触及我的皮肉，还要触及我的灵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大革命。这话错了没有？没错，是这样。对了没有，也没对。就是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结果。后一场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前面的这个文化革命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木匠造枷夹自家”。只是这个木枷，几代人你一锤我一炼的把它锻造成功，最后套上脖子，啪嗒一声锁扣上时候你喊了起来了，不对，毛泽东你搞错了。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他感到内心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到1978年“文革”终于在政治上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知识界出现的是什么呢，“文革”结束了，文化热大讨论开始了。你看“文化革命”、文化讨论，那么文化讨论的这个命题所向也是在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落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千错万错，错在我们是黄河文明，我们错在此前有个孔子，有个孟子。孔子、孟子创造了儒家文化，文化束缚了我们。我想文化热的讨论是在“文革”结束的背景底下展开的，但是文化热讨论的这个逻辑指向和“文革”的指向在否定之中有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热的讨论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了“文革”的一个精神内核：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从“五四”走到“文革”政治上破产了，那么“文革”结束以后知识界又有一场几乎延续十年的文化热大讨论，那么这个文化热大讨论，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继续延续那个文化决定论，模糊人们对制度创新，制度选择的这个认识。

我想当初推出文化热讨论的时候，始作俑者是明白的。因为当时刚刚结束“文革”，整个形势还不如现在宽松，现在我们已经把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写进党的决议，甚至于政治文明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了。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忌讳，所以文化热讨论的少部分始作俑者心里面是明白的，是没办法正面讨论制度选择，只能抚其后背，讨论制度和制度之间的软联系。那悲剧就在那里，始作俑者是一个话语策略，跟进的人不明白啊，跟进的人慢慢慢慢就弄假成真，真认为可以讨论的是惟一正确的内容。真认为我们民族的落后，现代化的障碍是要由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负责的。这个文化论讨论就滑稽了，走到后来就出现了一场“荆柯刺秦王”，不是刺秦王，而是荆柯刺孔孟的闹剧。没有勇气刺秦王，而有勇气刺孔孟，孔孟于九泉之下他也要大呼冤枉的。三千年前的两个思想家，怎么能够为三千年以后的不孝子孙落后于世界来负责任呢？这当中有多少次制度选择的三岔路口你们走错了路。无独有偶，当国内有一部分朋友迷恋文化决定论的时候，海外新儒家这个时候他们学说也进来，只是呢他们把这次文化决定论的几个论证的方向和国内的文化决定论调了一个个。国内的文化决定论是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吗？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否定传统的文化，才能够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现代化。那么海外新儒家呢是倒过来说，你们要建设现代化吗？这个现代化只能从从儒家的文化典籍里面从内向外开“内圣开外王”，从文化里面开出一个

现代化。所以两边是以相反的论证，论证同一个谬论。同一个谬论是什么，文化是决定的，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以两边吵得一塌糊涂，他们共享的逻辑前提确是一致的，同一个文化决定论。而这个文化决定论从“五四”到“文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展示过它的逻辑后果，只是不明白。“文革”否定了，“文革”的灵魂在文化热讨论当中延续下来，文化热结束了，但是文化热还可以在海外新儒家否定中国文化热的这个方向当中，继续延续下来。所以走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妨碍中国认识现代化症结所在的人，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商人，农民、工人、商人，他们是有具体的利益选择的。因不同的利益选择，而结出的结结实实的制度性障碍。

最近就是全国人大，北京大学全国人大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有一个报告，他到农村去做了一个报告，发表在南方周末整版上。他的这个报告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农民是否有民主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取决于他们是阿 Q，还是赵老太爷，而是取决于他们什么？他们的利益觉醒。阿 Q 就要自己明白，他最要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能被人无情的、无偿的圈占，他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民主要求。用不着去读鲁迅改造国民性写下的这个《阿 Q 正传》，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参政民主的积极分子。那么蔡定剑的这个报告就非常重要，他用非常实证的社会调查，实际上是否定了几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文化决定论。工人也是如此，商人就不用谈了对不对。真正就是让知识分子自己糊涂起来的呢，就是他天天在书斋里打交道的这个观念呀、精神呀、符号呀、文化呀，他把自己书桌上的这一摊看成是决定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了。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历史是在知识分子观念视野的背后展开的。

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们中国，两句话。我说上帝就是无心让中国人在一百年里面，饱尝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没有受过的这些苦难。但是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也有眼哪，它在同一块文化土壤上，它放了三个制度模式，让中国人就是哪一天明白过来看一看，文化是不是决定的。第一个模块在中国大陆，经历过从“五四”以来几次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破坏的就是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制度选择，你看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香港，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香港没有政治民主，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底下，但是它有自由经济，它有传统文化。我到香港去几次我发现，香港市民文化上的传统色彩远远超过我们内地老百姓，但是香港在 1949 年到 1997 年这个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叹不如的。大陆人自叹不如的。正是因为有香港走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刺激，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所谓到中国的南部圈一个圈，设一个特区，一定要设在香港的对面，深圳。这是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看台湾，我 1997 年到台湾去，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多少年不来往了，听说我到中央研究院访问，他们开着车接我回去。回去到他家，就是一家老小三代吃一个团圆饭，大陆来人了嘛，四十年不来往，我们家从大陆这边来一个学者他们很高兴，吃饭。吃饭以前是政治生活，什么政治生活呢，看电视啊。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党派候选人刚刚发表过竞选演说，然后就是老百姓做自己的政治参与的选择，四个中年人，三男一女，四个不同的投票方向，而且在吃饭以前，当着我一个大陆来的亲人的面，吵，骂，骂得不可入耳。（主持人：跟“文革”中间一家分成几派一样的。）

跟我熟悉的“文革”当中就是一家分成几派，夫妻吃不成一桌饭一模一样。那个骂，你个就是，你那个李登辉是个什么东西。那边骂你那个陈水扁是个流氓。第三个又骂谁谁谁谁。我

想这顿饭我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你们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哎，饭做好了，老太太说上桌吧。一上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老大坐当中，右手是大陆来的客人，这边是老大，这边是老二，老三、老四长幼有序。酒杯一端必须先敬老太，第二杯敬大陆来的亲人，其乐融融。半个小时以前是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那次我感触良深，就这一桌饭就使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它是不必破坏，也不必往外面开，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我想那桌饭一个小时，前半小时加后半小时胜过我在大陆读十年书。十年文化讨论的书。所以我今天讲到现在千言万语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这常识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制度选择。”我先讲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欢迎你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乃至尖锐的反驳，我们在讨论当再展开这个话题的纵深好不好

主持人：刚才朱教授的这个精彩演讲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听得已经入了迷了，那么现在是进入讨论阶段。下面我想请这个，把话题交给现场的观众。

提问：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精彩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听了朱教授的讲座之后，对于制度的选择到底是由少数人的选择，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决定产生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变迁，而在社会的进程中，是少数的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程的主导推动者。我的问题完了，谢谢朱教授。

主持人：谢谢这位同学。

朱学勤：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学校讲演的时候也多次遭遇，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是这样：我想一个制度的方向正确与否它确实是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推动息息相关，那么在这一意义上说，一个正确的制度它首先确实来自于什么？千百万人的利益觉醒和利益推动。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简单的一个逻辑锁定的关系，不，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有权力参与制度选择驳议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是有可能既阻拦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势所要求的那个方向，也可能把这个方向强行拨向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正好反对的那个方向。这个时候政治家的责任，成与败的责任，几乎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看到凡是制度选择正确的地区、民族、国家，那么政治家的选择基本上跟底下这个东西是一个正相关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制度选择，一旦选择了以后，它就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这种支持更新。而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我们也是经常看见，时时常常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但是我们接着看到的第二页就是，每当出现这种选择的时候，它就把一时的成功归结为是什么少数人的英明，把长久的失败归咎于多数人的愚昧。我想你们是能够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不费劲就能看到这样两种不同的说法同时存在的。所以我在这里想讲的就是民众、少数政治精英和制度选择之间，这三个层面，在中间这个层面是会发生种种让人意外的变化的，当发生意外的变化的时候，选正确了你也应该承认这就是少数人的英明，选错了你也就应当承担少数人的错。比如说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就是那五十五个人，在一个叫费城独立厅的地方关起窗帘秘密讨论了三个多月，如果这次宪政选择是错误的，没有理由归结为当时二百万美国人民，就是你五十五个人的错误。你今天正确了，事后宪法草案出来，经过十三州公民的投票同意，投到第九州就成功了，成功了到现在人们还是铭记着那五十五个开国英雄的功劳，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反对一个正确的制度选择和千百万人们利益之间的正相关，我反对的是什么，做对了说自己的英明，做错了是多数人的愚昧，这样的一种教科书的解释。

主持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插一句，因为使我想起萨特说起的一句话，萨特经常讨论这个欧洲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所以萨特有一句话说得是很极端的，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

朱学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一段插话，我作为中华民族知识界的一员，我觉得应该和整个知识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历史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控诉、咒骂。我是受害者，不，在你被受害以前，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是参与了导致迫害你的这一场人间地狱的制作的。你的文化革命不打引号的理想，是参与了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洪流的来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反对过去的那个历史学界的讨论，到底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我认为是奴隶和英雄同时创造历史，是英雄的责任不要推到奴隶头上去。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主持人：还有哪一位？好。

提问：谢谢朱老师，你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一种很不同的观点，然后我想从你的开始从“五四”开始讲的是，你说“五四”之后它有个文化决定论，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然后朱老师提到是从法国起源，然后俄国中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而朱老师没提到，中国本身历史上的原因，就说比如说汉武帝时候的那种独尊儒术其实已经开始对国民精神方面开始控制了，然后一直到很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朱老师没有提到，我想问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也说“五四”，我理解“五四”最核心的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然后一直以来我也觉得它是对思想一种解放，它引入了一些东西，它是对思想解放而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这两点不是很了解，也希望朱老师给我们一个回答，谢谢。

朱学勤：我尽量简短地来回答这两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主持人：有可能造成对你讲演的误解的问题。

朱学勤：没有，这个汉武帝这个罢黜百家我为什么没有提，因为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除了从中学教科书一直到大学教科书的说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认为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就是独尊儒术不是来压制民生，压制民权，更多的是用来限制君权，限制汉武帝。

主持人：恐吓皇帝。

朱学勤：恐吓皇帝，吓唬他，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的回答到这里，你可以找到那些资料。第二个呢你说“五四”是鼓吹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呀，不错，完全对，正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国，俄国式的思想解放恰恰就是什么？观念的个性解放，观念的个性解放，而不是什么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英美这边你去看，在它们早期革命的时候，并不是奔腾的个性解放，而是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追究，就是制度选择的保护。这个差别很大。你去看我们的“五四”型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反对旧式婚姻，追究个性解放然后投身新文化的运动的洪流，他们的民主，更多的是什么？个性解放的民主。个性解放的民主下一步就是鲁迅已经说的，鲁迅说的我骨子里，我想深处是个人的无治主义，无治主义在“五四”时期就是安那基主义，安那基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从个性解放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到不需要现代社会的法制束缚的这样一种无法无天，你说毛泽东的青年性格，一直到他“文革”发动就是所谓，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那种做法，这个之间是能够找到“五四”型思想解放的偏颇以及后果的。

主持人：我做过一个材料统计就是“五四”的思潮中间，引进的西方各种思潮中间，其实是以非理性思潮为主，而不是英国传统的理性思潮为主，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五四”时期大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朱学勤：没有无政府主义的铺垫，他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那句话没说错，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之前还应该说，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的“五四”型，“新文化运动”型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已经在信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走廊。而英美这边你看一看，无论革命前的所谓思想家，根本没有提出过无政府主义，如果有基本上就不是主流，还是革命当中的领袖人物。无法设想无政府主义底下的一个乌托邦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啊，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成为英美知识界，知识生活的一个主要市场，而恰恰是这个东西成为了我们“五四”型解放思潮的一个主干，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理解为跟“五四”的正相关关系，能够比目前知识界流行的把它想象成一个负相关关系，能打开更多的精神视野和历史纵深，能够促使我们思索得更多更久远。

□ 原载《新世纪》网站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